



中国

吴小如◎主编

刘玉才 刘宁 顾永新◎编著

文化史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

吴小如 主编

刘玉才 刘宁 顾永新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纲要/吴小如主编;刘玉才,刘宁,顾永新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301-05009-5

I. 中… II. ①吴…②刘…③刘…④顾… III. 文化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109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史纲要

著作责任者: 吴小如 主编 刘玉才 刘宁 顾永新 编著

责任编辑: 张弘泓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5009-5/G·065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1 印张 342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7 年 8 月第二版 2008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增订补记

本书出版五年来,反响良好,先后被多所高校指定为中国文化史、中国传统文化课教材,并数次重印,我们作为编撰者,颇受鼓舞。为了能够广泛吸收学界近年的研究成果,完善相关的论点与提法,并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要,在责任编辑张弘烈 的催促之下,我们进行了这次修订。在修订中,我们除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之外,还尽量吸收主讲教师和学生来自教学实践的反馈意见,对全书约三分之二的篇幅进行了改写。同时,为体现多媒体教学的成果,增加学生的直观印象,我们还增入了一百余幅图片。此外,每章之后增设思考题,为课堂教学提供便利。中国文化史头绪多,涉及面广,我们的文字叙述肯定存在不少的问题,希望使用此教材的高校师生和广大的社会读者不吝指教。是为记。

刘玉才

2007年2月

目 录

绪 论	(1)
-----	-----

上古——构筑中华文化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肇基	(9)
第一节 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	(9)
第二节 从聚落到国家	(11)
第三节 神话传说的文化寓意	(19)
第四节 文字创制	(26)
思考题	(34)

第二章 从神本走向人本	(35)
第一节 绝地天通与神巫社会	(35)
第二节 宗法建构	(43)
第三节 宗周礼乐文明	(52)
第四节 青铜文化的人文内涵	(56)
思考题	(61)

第三章 解放的时代	(62)
第一节 王纲解纽 礼崩乐坏	(62)
第二节 区域文化格局的划分	(66)
第三节 游动的时代	(73)
第四节 百家争鸣	(78)
思考题	(83)

第四章 帝国建构与文化整合	(84)
第一节 大一统的历史观念	(85)
第二节 秦汉制度层面的整合举措	(87)
第三节 思想权威的确立	(94)
第四节 海纳百川	(102)
思考题	(108)

中古——开放融合时代的文化繁荣

第五章 中古的社会与文化	(109)
第一节 门阀社会	(109)
第二节 士族风流	(115)
第三节 科举制和门阀社会的逐步解体	(120)
第四节 盛唐气象与中唐后的变局	(128)
思考题	(133)

第六章 宗教的兴盛	(134)
第一节 佛教的译传	(134)
第二节 佛教的本土化	(139)
第三节 道教的兴起与发展	(145)
第四节 宗教生活的多元化	(149)
思考题	(154)

第七章 学术思想的变迁	(155)
第一节 魏晋玄学与清谈	(155)
第二节 经学传统的绵延	(160)
第三节 儒家的道统思想	(165)
第四节 儒释道三教合流	(170)
思考题	(174)

第八章 文化的融合	(175)
第一节 五族入华.....	(175)
第二节 华胡一体.....	(180)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外传.....	(188)
第四节 文化的兼容并包.....	(195)
思考题.....	(200)

第九章 艺术与技术的兴盛	(201)
第一节 诗国高潮.....	(201)
第二节 乐舞繁荣.....	(206)
第三节 书画异彩.....	(211)
第四节 科技成就.....	(219)
思考题.....	(224)

近古——传统重建与文化转型

第十章 专制政体下的文化政策	(225)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发展.....	(226)
第二节 盛世修典.....	(233)
第三节 文字狱.....	(240)
思考题.....	(245)

第十一章 文化事业的兴衰	(246)
第一节 学校和书院.....	(246)
第二节 雕版印刷.....	(253)
第三节 典籍聚散.....	(258)
思考题.....	(263)

第十二章 学术思潮的演变	(264)
第一节 理学与心学.....	(265)
第二节 清代考据学和汉宋之争.....	(272)

思考题	(278)
第十三章 雅俗共赏的文学艺术	(279)
第一节 主流文学形式的演变	(280)
第二节 戏曲音乐	(291)
思考题	(301)
第十四章 异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302)
第一节 少数民族汉化和民族同化	(303)
第二节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渐	(310)
思考题	(317)
第十五章 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318)
第一节 宗族制度的特征与功能	(319)
第二节 宗教的世俗化	(325)
第三节 市民社群与市井文化	(333)
思考题	(340)
主要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43)
增订补记	(345)

绪 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诸子思想、唐宋诗词、坛庙宫观、陵墓石窟诸多无形、有形的文化遗产，至今我们仍引以自豪。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对中国有所了解的外国人，随口都可举出许多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大到长城、兵马俑，小到筷子、扇子，不一而足。但是要问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应该如何进行描述？恐怕就众说纷纭，难得一辞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

“文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其语源是近代学人对拉丁文 *Cultura* 的意译，而借用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及“文化”等语义，加以融铸再创而成。《易·贲卦·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正义》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文”、“化”的意思是指以“人文”来“教化”天下。刘向《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的意义仍是以体现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化”乃主谓结构，基本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大约指文治教化的总和，与天造地设的自然相对称，与无教化的“质朴”和“野蛮”形成对照。

拉丁文 *Cultura*，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等多重意义，包含着通过人为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16、17 世纪，欧洲 *Culture* 一词的含义逐渐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引

向精神生产活动,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似乎与中国古代的“文治教化”相异趣。此后,文化做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被众多学科所探究、阐发。但是文化这一术语的广泛使用,也导致了其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各学科学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主观感知与理解的“文化”,按照各自确定的准则,给文化做出界说。因此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文化的定义有二百余个,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定义获得公认。以致西方学者罗威勒认为,要给文化下定义如同把空气抓在手中一样困难,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无处不在。

文化的定义如此纷繁多歧,令许多学者望而却步。然而做为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定义又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史,也必须对文化有一个大致的界定,不然就会千头万绪,无从谈起。首先,有必要就“文化”与“文明”概念的内涵加以区分。我们采纳德国学者埃里亚斯(Elias Norbert, 1897—1990)《文明的进程》一书的观点:第一,“文化”令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时刻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与特色,而“文明”则使各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表现着人类普遍的行为和成就。简而言之,就是“文化”让各个民族不一样,而“文明”则使各民族越来越接近。第二,“文化”是不必特意传授,经由耳濡目染就可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则需要学习才能获得,因而总是和“有教养”、“有知识”之类词语相连。第三,从某种意义而言,民族“文化”易于固守不变,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抗拒,而“文明”往往总是在运动中前进,表现出殖民和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文化”与传统相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则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据此,我们所要叙述的文化显然属于狭义的范畴,如果非要用文字加以规范,或可描述为是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的、由各种集体意识所形成的社会精神力

量^①。此项界定包含四层意思：首先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它属于意识和精神的范畴，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其次文化具有社会性，它不同于人类本能（生理、心理）的精神力量，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依靠后天的教育、学习而获得。文化的社会性还表现在其总体既有一定的社会幅度，又有综合性，它不是指个体的某种精神力量。再次文化是集体意识的产物，而非个人意识。集体意识是相对于容格的“集体的无意识”而言，是后天习得或养成的，具有明显的意识性。最后，文化对具有一定社会共同性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引导或制约作用。文化作为社会精神力量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它无论表现为一种有约束力的氛围，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或表现为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都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或使人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或使人自然遵循某种视为当然的惯性，或使人必须遵守种种规范，总之是对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起到引导和制约作用。

做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自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加以实现，以成为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广义文化现实；同时，各种文化载体的研究成果，也会有助于界定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载体，在现实世界中可谓千姿百态，不胜枚举。但是就其形式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类：（1）实物制作表现；（2）规章制度表现；（3）礼仪习俗表现；（4）语言符号表现。当然这期间不乏跨类交叉，比如艺术与审美观念，它既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论证，也可以体现在物化了的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影视、时装等等作品之中，还可以在礼仪习俗中有其表现。而正是观念形态文化的四类载体及其错综复杂的交叉表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现实。

文化史，顾名思义是探讨文化发展的历史，既然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势必造成文化史研究对象的五花八门，这也是文化史研究面临的最大难题。文化史属于广义的历史学范畴，但是在很

① 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

长时期东西方史学著作中,没有给予文化应有的地位。在西方,迟至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及文化人才开始跻身史著,至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文化史才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科,获得应有的地位。法国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1694—1778)在此方面立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因而西方学术界称其为“文化史之父”。伏尔泰把历史看作理性与迷信的斗争过程,他反对只记载帝王将相活动的编年体史著,力主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史学研究的范围。他在《风俗论》的序言中宣称,他的著作的目的,“不在于指出某年某个可耻的君主继另一个残暴的执政者之后”,而在于指示“主要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他认为数千次战争没有给人类带来任何利益,而莫里哀、笛卡尔的作品将成为后人永久快乐的源泉。伏尔泰本人的史学实践充分展现了文化史的旨趣,他的力作《路易十四时代》描绘法国路易十四执政时期社会生活的全景,其中包括艺术与民俗,战争与外交,科学与技艺,成为近代文化史的滥觞。伏尔泰之后的两个世纪,西方涌现出大批文化史著作,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史学限于上层政治的狭小格局,把研究视野扩展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社会制度、人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及各种文化现象。在这种把社会、民族及其文化视作历史主体的思想支配下,19世纪下半叶至今,文化通史、国别文化史、各类文化专史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中国古代历史著作虽然不乏文化现象的记载,如正史中有关的志书,但主要部分仍是帝王将相史。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化史研究是“五四”前后,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而展开的。一批西方人所著的文化史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桑戴克(Lyun Thorndike)著、冯雄译的《世界文化史》,日本人高桑驹吉原著、李继煌译述的《中国文化史》等。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开始仿效西方学术体例,参酌其史观,自行编撰中国文化史专著。梁启超可谓开其先河,他首先提出撰写文化专史,并拟就了《中国文化史目录》,可惜只完成了其中的“社会组织篇”,做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材。“五四”以后,文化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许多文化史专著都尝试把叙事中心从原来的帝王将相政治军事史,转移到民族史、学术思想史、语言

文字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科技史等方面。其间如柳诒徵、陈登原、陈安仁各自以《中国文化史》命名的巨著，均从远古叙述到民国，不仅体例有别于传统的通史著作，而且资料更为翔实。孟世杰的《先秦文化史》，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研究》，则已注意到社会历史分期问题，尝试进行断代文化的系统研究。夏光南的《云南文化史》，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郑德坤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徐嘉瑞的《大理古代文化史》，开始致力于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史研究。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更深入到各种文化层次的研究。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则把中国文化史置于世界范围进行考察，通过比较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性。王云五《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还专门介绍国外学者有关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著作，提供学界作为编纂中国文化史之借鉴。此外，有关中国文化史的普及类读物也大量涌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唯物史观成为历史学界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史研究被做为唯心史观加以批判，趋于沉寂。“文革”十年，更是阶级论至上，偶像坍塌，传统崩溃。古代中国被贴上“奴隶”、“封建”的标签，没有了《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场景，只剩下鲁迅《狂人日记》冷冰冰的“吃人”二字，历史著作成为枯燥的教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西文化问题再度被作为论题，而伴随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亚洲经济的崛起，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学界审视的对象，并形成新的研究热潮。高揭“文化”旗号的论著层出不穷，内容所及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制度到生活日用，文化几乎成为包罗万象的代名词。近年，更有所谓“国学热”的兴起，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老庄佛禅，借助各类媒体的推波助澜，走下学坛步入社会，成为现代人的心灵鸡汤，而文化的图像更加朦胧暧昧。

纵观“五四”中西文化论战和近年的传统文化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史研究仍然受到文化内涵与外延模糊的困扰。首先，文化、文明不加辨析。许多论著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视作人类物质和精神创造的总和，于是文化外延无限扩大，无所不包。其次，制度与文化混为一谈。制度无疑是文化的核心，但不能据此以固守

民族文化为理由而为制度弊端进行回护,同样也不能因为制度弊端而对民族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再次,偏重上层文化,忽视底层文化。儒教文化几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再次,把原本流动渐变的文化传统,描述成恒久不变的传统。让受众认为,我们承继的就是如此“历史”,要么当成沉重的包袱,要么当成消受不尽的资源,进而导致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实际基于现代视角所批判的传统,可能只是“想象的传统”,西学术语称之为“发明的传统”,而真正符合所谓传统特征的时代,在两三千年间,大概只有明代初年到中期那极短的一段。为摆脱上述传统文化观念的局限,我们在本书中力求贯彻前文对狭义文化的界定和关于文化史的理解,不斤斤于文化体系的建构和文化特征的描述,而是依照历史演进的顺序,叙述不同时期主流文化思潮、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基于不同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多种历史分期方式。我们在本书中,沿用传统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分方式,描述中国古代文化史。我们认为,三分方式不仅是时间的划分,而且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演变观念。具体到文化史来说,三段时期的文化发展,既有前启后继,又各具鲜明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灿烂长河。上古涵盖秦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和奠基时期。我们的先民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创造出了独立的文明,早期中华文明呈多元发展趋势,尔后历经漫长的兼并融合过程,逐步完成了从部族群落到国家的过渡。夏、商、周三代是文化史上关键性的时期,影响中国历史的许多文物制度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期奠定。夏、商、周文化发展呈现由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态势。夏、商时期,神巫明显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周文化则相对偏重于世事。周公“制礼作乐”,其模式化、规范化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宗法家族制度主要是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因而也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范本。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人获取了独立的身份,在诸侯分治,相对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四方游走,宣扬自己的学说,博取诸侯的青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奠定了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基础地位。在文化多元发生、诸子百家争鸣的同时,文化整合

的力量也在孕育,天下一统的心理趋势,不仅是对秩序的渴望,也是强烈的文化认同。秦的统一,在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初步形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的基础铸造工程正式完成,中国文化进入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新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八百年间为中古。中古时代,中国社会有两个主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由于门阀制度的长期存在,士族文化得到深入的发展。其二是由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唐朝开放的对外政策,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行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表现出开放的文化性格。前者使作为文化精英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激发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后者则为文化的进步提供广袤的土壤。这就促使中国文化在精深与宽广两方面都获得长足的发展,而精深与宽广的融合,造就了文化的高峰,无论哲学、宗教、艺术在这一时期都焕发出异彩。

近古指宋元明清时代,这既是历史学、语言学上的分期,同时也是社会学、哲学上的分期,因为在这些领域,各个朝代都表现出相对一致的特征和明显的承续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近古时代,基于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景象。而在专制政治强化的前提下,文化政策也表现出新的特点。学校和科举已经完全结合,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直接联系起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盛世修典以宣扬文治、粉饰太平、拉拢知识分子;利用文字狱来禁锢思想、钳制舆论,迫害士人。近古社会又是市民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市民社群的形成和市井文化的定型上,更反映在文学适应市井社会的文化要求,从宋词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说的脱雅入俗,宗教迎合市民精神需求的民间化、世俗化倾向。在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同时,近古时代又不断地出现恢复、重建传统的号召。社会形态方面,倡导重建西周春秋的典型宗法制度;在学术领域,宋明理学以恢弘孔孟以来儒家道统为己任,乾嘉考据学以复兴汉代古文经学为旗帜。虽然不是真正意义的回归与重建,但反映了经过中古开放融合时代的文化繁荣之后,人们对于传统的一种追思和再认识。近古

时代,域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的汉化,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更是展现出文化转型期丰富多彩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文化史研究应着眼于文化背景、文化氛围的揭示与分析,探讨纷繁文化现象的成因,而不是只关注文化表象,甚至把文化割裂为条条块块,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本书即是循此观念进行的努力与尝试,同时内容照顾到点与面,时间与地域,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尽量勾勒中国文化的面貌,以求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观念和认同感。

上 古

——构筑中华文化

第一章 中华文明的肇基

第一节 中华文明发生的地理环境

中国大陆是一块古老的土地,1800 万年前的大陆板块运动,造就了自“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向东南沿海倾斜的地势,形成了山地、高原、丘陵、盆地和平原的不同地貌,南北气候历经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具备了不同的生态景观。中华民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黄河、长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当然,相对于这块土地的沧桑巨变,中华民族的历史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瞬,中国文化的兴衰沉浮,也不过是几千年的事。但是,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化的起源发生,就必须关注这块土地的地理生态环境,关注人类自起源到有史社会的漫长进化历程。在地理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有“地理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地理条件规定着民族性与社会制度,制约着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化讨论中,还有人用黄色陆地文明和蓝色海洋文明概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并得出中华文明落后的结论。对于此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我们自然无法认同,但是决不意味着漠